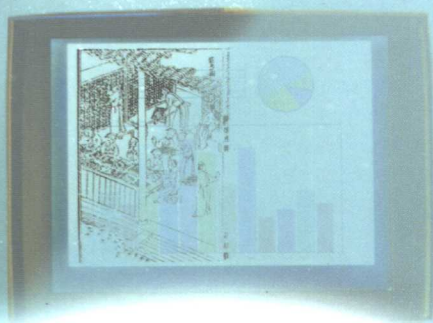


信息时代的 传播学

李 启 吴廷俊 关颖超 主编

*HUMAN COMMUNICATION
SCIENC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新 华 出 版 社

信息时代的传播学

李启 吴廷俊 关颖超 主编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时代的传播学/李启等主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1-5542-9

I. 信… II. 李… III. 传播学-现状-中国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322 号

信息时代的传播学

李启 吴廷俊 关颖超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42-9/G·2023 定价: 19.00 元

前 言

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代创建于美国的新兴科学。它是一门边缘科学，是集中研究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及与其有关的语言、文字和传播媒介的产生和演讲过程等方面的规律和理论的科学，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的80年代，即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之后引进的。

1983年，我国出版了第一本介绍传播学的小册子《传播学（简介）》；1984年，出版了第一本传播学论著的中文全译本《传播学概论》（美国威尔伯·施拉姆著，英文原名是《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了解人类传播》）。

1988年，第一本由三位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合编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此书是详尽介绍美国多位传播学者论著的集录。

此后，传播学论著的中文译本和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论著陆续出版。事实上，这些中文译本或论著都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脱出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的框架和内涵。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者也在致力于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研究。1997年，在北京出版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播学论著《华夏传播论》。本书是由海峡两岸和香港的28名中国学者历时3年多协作攻关完成的。正如此书的内容提

要所说,“本书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硕果”。它“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传播概念和传播特性,各种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传播技术、各种不同领域的传播,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对它们进行研究和总结,会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世界性的发展做出贡献”。

时代在前进,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传播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因而也受到时代的局限。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即90年代,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社会)的高级阶段——网络时代。

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三项信息科学上新发明(数字化信息革命、光缆激光传输讯息和多媒体技术)的问世,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高级阶段——网络时代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迎来了90年代初开始因特网(互联网)的大发展,开启了人类传播的新篇章。新的时代呼唤能阐明新时代特点的传播科学论著。

本书主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起草了“信息时代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课题设计论证,指出,根据在学术上创新的精神,“我们不仅要论述传播上的中国特色,而且应当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吸收其中符合人类不同民族国家进行传播的共同规律的理论,同时应当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

这个课题既没有国家课题基金的资助,也没有挂靠单位的支持,而是由主编商请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分别承担其中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和撰写工作,而且参加者又大多都是在本职工作之余的时间做撰写工作的,这些特殊情况使全书从1999年年初提出课题设计论证及随后同作者商定本书各章的撰写提纲,因而完稿时间一再推迟。可以庆幸的是:这本由不同学科的一共十三位学者专家分工协作撰写的论著《信息时代的传

播学》，历时将近三年，现在终于已全部定稿，可望在近期出版。

本书的主编是李启、吴廷俊、关颖超。全书十章的作者分别是：第一章、第二章李启。第三章李国正。第四章朱赛虹。第五章吴廷俊、唐润华。第六章闵大洪、陈俊峰。第七章温飏、关颖超。第八章丁新。第九章于清文、余志和。第十章关世杰。

承资深新闻工作者李普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首届韬奋奖获得者、人民出版社编审戴文葆同志对撰写第四章给予指导，谨在此致谢。

李 启

2001年10月

作者简介

- 丁 新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于清文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 关世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关颖超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级编辑
- 朱赛虹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
- 吴廷俊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 余志和 新华社高级编辑 新华社索非亚分社社长
- 李国正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 李 啟 新华社高级记者 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 闵大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 陈俊峰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 唐润华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外国新闻研究室主任 高级编辑
- 温 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主任 副译审

目 录

前 言	(1)
作者简介	(4)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创建	(4)
第二节 传播学和中国	(7)
第三节 求索创新	(15)
第二章 创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20)
第一节 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21)
第二节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	(26)
第三节 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创建	(33)
第三章 汉语、汉字——中国人传播思想文化的 工具和汉字的信息化	(38)
第一节 汉语作为传播思想文化工具的特色	(40)
第二节 汉字作为传播思想文化工具的特色	(48)
第三节 汉字信息传播的创新	(68)
第四章 从手写 to 印刷——人类传播手段的飞跃	(74)
第一节 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背景	(74)
第二节 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发展	(80)
第三节 近代印刷技术的变革	(96)

第四节	现代印刷技术的腾飞	(98)
第五章	因特网——人类传播的新篇章	(101)
第一节	因特网的产生与发展	(101)
第二节	因特网与传统媒体的关系	(110)
第三节	因特网对社会文化的冲击	(125)
第六章	因特网与报刊新形态	(138)
第一节	外国报刊史	(138)
第二节	中国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144)
第三节	当代报刊多种新形态	(150)
第七章	独特的中国广播电视	(170)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新阶段——电子媒介	(170)
第二节	广播电视在中国	(179)
第三节	因特网与广播电视	(199)
第八章	现代远程教育——从广播电视教育 到网络教育	(208)
第一节	远程教育概述	(210)
第二节	广播电视大学概述	(216)
第三节	现代远程教育概述	(243)
第九章	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	(258)
第一节	信息产业	(258)
第二节	知识经济	(277)
第三节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293)
第十章	跨文化交流的新形势和对策	(297)
第一节	新信息技术和交通便利给跨文化交流 带来的新形势	(297)
第二节	目前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形势	(311)
第三节	世界格局中的东北亚文化	(319)
第四节	我们的对策	(330)

第一章 绪 论

在大千世界中，在人与人之间，在生物和生物间，在自然界，无一不存在信息的传播活动。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

正如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所指出的，人类“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息渠道”。“我们建立传播关系是因为我们要同环境，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人类环境相联系。”^①

中国有这样两句形容自然界和动物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名言：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讲的是人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传播的信息；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则指的是动物间的信息传播。

但是，人类传播不仅有别于生物，也有别于一切动物、包括灵长目的类人猿这些大脑较发达的高等哺乳动物在内，这是因为人类是惟一具有语言和思维能力的动物。人类是在从类人的动物能人（Homo habilis）进化到早期的人类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使用语言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在学会使用语言的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的规则与说话的规则是相同

^① 《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的。思维即内向操纵语言。而具有思维能力和用特定的声音即语言进行传播，是人类有别于高等的哺乳动物类人猿的标志，是能人进化为人类的革命性的转变，成为最早的石器时代的人类。北京人和爪哇人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人类。^①

中华民族是人类中最早进入到以使用文字为标志的文明社会的民族之一。古代的以汉语和汉字紧密联系的华夏文明，是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相并列的四大古代文明之一。^②

中国的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造纸和印刷术，从中国流传到亚洲近邻的朝鲜、越南和日本，也远远流传到欧洲。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论述“大众媒介的产生”时曾写道，“中国在公元2世纪时发明了纤维纸和墨，而且中国和朝鲜乃至在欧洲开始使用金属活字之前至少一个世纪就已发明了它。优良的印刷纸和墨、木板印刷技术和亚洲其他发明逐渐向西方传播。亚洲至少比古登堡早500年就有了木板印刷。”15世纪中，在德国城市美因兹，古登堡“依靠最先在东亚发明的技术制造出来了墨和纸并使用它们。他所使用的印刷机是拿西欧做酒的压榨机改装的”，“他发现了效率高的铸字方法，因为他排印的是音节（拼音）文字，不是表意文字。他把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创造了一种可行的一次印刷多份书面经文的办法……于是，15世纪40年代初或约在1456年，就成了庆祝大众传播开始的日子，前一个日期是庆祝印刷文

① 《世界文明史》，（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页。

② 《世界文明史》，（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35~267页。

件，后一个日期是庆祝古登堡印刷的《圣经》”。^①

他接着写道：“究竟是文艺复兴促进了印刷媒介的发展，还是印刷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和观念，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系列相互作用。书籍和报纸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②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登堡因为他采用了西欧造酒的压榨机改装的印刷机，发现了适用于拼音文字的效率高铸字方法，使欧洲的印刷业与社会的工业化同步前进，在15世纪40年代就成为有功于大众传播的名人。而中国的停留在靠体力劳动的印刷术则落后了。

至于三种电子媒介，无论是电影还是两种广播媒介——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都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威尔伯·施拉姆称为“科技发明的世纪”这段时间里研制成功的。这段时间具体指的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他还说过：“人类传播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从传播技术的新的重大发展开始的。”^③因此，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突破上都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只能在这三种电子媒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普及和饱和状态的数十年之后才得以引进然后逐渐普及。

① 《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② 《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③ 《人类传播史》，（英文）（美）威尔伯·施拉姆著，哈登·科林斯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

第一节 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创建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与人类一起产生和发展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我国的文明史中，有大量前人提出和总结的传播观点和原理。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把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本世纪 40 年代才由西方学者，更确切地说是由美国学者首倡和完成的，并且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大众传播媒介最早发达的国家，因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美国传播学者威廉·艾林在《大众传播研究》一书中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作了这样的概括：“广告商和舆论测验者都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对象的组成与反应感到兴趣，前者是要判定新闻媒介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后者要判定新闻媒介对于选民的投票决定的影响。因为对大众传播媒介感兴趣的人甚为广泛，如市场研究人员、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新闻教育家、民意测验者，以及广告、广播电视、杂志和报纸的从业人员，所有这些方面的人，都把他们的调查研究叫做大众传播研究，如果不是较为确切也是较为方便，于是大众传播媒介这个相当长的名词（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这个名词在 1928 年首次收入牛津大词典——笔者），很快就在学者、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以及普通人中间流行起来了。”“大众传播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是以科学分析为特点的 20 世纪前半期的产物，由于把科学实验的调查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前人所未曾探索的自然、生物和社会现象，这

就产生了大众传播研究。”^①

对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具体研究情况（不涉及与之有关的学科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就会知道，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是受到 40 年代美国科学家提出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传播学借用通信技术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的概念和术语，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

关于传播学早期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有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威尔在 1948 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 1948 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这两篇论文至今仍然被传播学研究者推崇为经典性的学术论文。接着，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 1949 年主编出版的《大众传播学》，则是关于这一学科的第一部论著。

关于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科学定义，却是迟到 80 年代，才由两位学者提出的。

什么是大众传播学，美国传播学者詹姆士·哈勒斯在 1985 年出版的《大众传播评介》一书（英文）中下了这样明确的定义：大众传播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在学术上是直接扎根于同属行为科学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之中，并同这些学科相互借用假设、理论和知识”，“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聚焦于在大众媒介中的及围绕它们的人的活动，以期得到关于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可靠知识”。^②

那么什么是传播学、它同大众传播学的差异何在？威尔伯·施拉姆在 1982 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写道：“人类传播

① 转引自《传播学概论》，译者前言

② 《大众传播评介》（英文），（美）威尔伯·施拉姆著，哈登·科林斯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21 页。

是人做的某种事”，是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试图共享某种信息”。我们研究传播时，是研究人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他人和享受娱乐”。概括地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各种传播活动及与其有关的语言、文字和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和演变等方面的规律的科学。因此，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在198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对传播学定义作出的解释是：传播学就是要“解释人类传播过程的基本性质，从诸如语文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这样一些领域里得出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线索，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充分描述整个人类传播，然后方可以估量出使用复杂媒介的大众传播的地位”。^①

这就是说，传播学理应对传播演讲所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研究作出评价，不能仅仅限于对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和追溯历史上的问题进行论述。而是应当对以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和90年代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出现后的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网络时代的特征和问题，也加以介绍和评价。

但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国学者在80年代曾简略地展望和指出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和重要意义。

威尔伯·施拉姆写道：“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与其说是自然资源而不如说是知识有可能成为人类的主要资源以及力量和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今天在美国，从事向公众提供知识这一工作的人数，现在正在超过农民和产业工人。”^②

^① 《大众传播学诸论》，（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新华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0页。

^② 《大众传播学诸论》，（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新华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9页。

梅尔文·德弗勒写道，现代社会通常被称为信息社会，这“概括了经济的一种大规模转化，以批量生产汽车和钢铁等有形商品为特点的工业社会，正让位于把经济建立在生产和分配无形信息服务业基础之上的社会。信息服务业包括法律、行政、旅游、娱乐、医药、金融，当然还有科教事业。以计算机（微机和主机）为基础的传播和信息系统，在这种信息服务经济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

第二节 传播学和中国

传播学引进到中国大陆，应当是始于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因为虽然在这次讨论会之前，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于1978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介绍日本传播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报告，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于1982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四位奠基人的学术报告；《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随即刊登了介绍传播学的文章。但毕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举行的传播学讨论会，在全国是第一次研讨传播学的学术会议。参加者主要来自京、沪、穗、厦门的四所大学和两家新闻研究所。代表这六个机构的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的马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陈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4个代表，即钱辛波、张黎、陶涵和徐耀魁；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李啟。这些人当中，只有徐、陈两位是中年，另外7

^① 《大众传播学诸论》，（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新华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71页。

个人都是花甲上下的老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教师。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阅读的关于传播学的材料，是一本书和两篇经典性论文。一本书是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1975年所著、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编译的《传学概论》；两篇文章是哈罗·拉斯威尔在1948年写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同年写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两篇文章的译文参加者每人都有一份，但《传学概论》当时只有从新闻研究所图书馆借来的惟一的一本，只能大家轮流传阅。

三天的学习讨论取得两大成果：与会者根据新闻研究所同志从港台出版的著作对传播学概念、术语的译名整理出共五页的英、中文对照表，逐字进行讨论，决定了大家认为更适合大陆习惯的文字，从而避免此后在翻译写作中因译名不统一引起混乱。

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一条关于对传播学从引进、研究到创建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就是说我们对待传播学的正确态度是要反对两种盲目性：盲目地照抄照搬和盲目地排斥反对。这十六字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对传播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在讨论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思想比较一致。会议召集人钱辛波概括大家的意见后总结成这十六字，经讨论后确定下来的。

在这次会议以后，从1983年1月开始，在我国的两大新闻月刊上，首次刊登了介绍传播学的文章。李敏在会后撰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的文章，先是刊登在《新闻业务》1983年1月号上；《新华文摘》3月号全文转载。而《新闻战线》在1983年3月至10月的连续8期中，先是连续刊出郑北渭写的《传播学简介》的7篇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题为《对西方传播理论的一些认识》，是作为解答和消除读者疑问写出的，由郑北渭和俞景璐合写。可以说正是由于两大全国性新闻刊物的介绍文章和《新华文摘》的转载，这才使传播学从大学学报上的学术问题，被介